

- Thomson, Philip J. 1972. *The Grotesque*. London: Methuen.
- Tomlinson, John. 1991. *Cultural Imperialism: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P.
- White, Hayden. 1986. "The Historical Text as Literary Artifact," *Critical Theory Since 1965*. Eds. Hazard Adams and Leroy Searle. Tallahassee: Florida State UP. 395-407.
- . 1987. "The Value of Narrativity in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The Content of the Form: Narrative Discours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P. 1-25.
- Wolin, Richard. 1994. *Walter Benjamin: An Aesthetic of Redemption*. Berkeley: U of California P.
- Woolf, Virginia. 1966. "Modern Fiction," *Collected Essays (Volume Two)*. London: Hogarth P. 103-10.

後殖民之外

——尋找台灣文學的「台灣性」

「文化中國」之外

林瑞明教授有一次應邀至中興大學演講，提到他到中國大陸參加學術會議，往往遇到中國學者對他說，台灣和中國都是「一家人」，都是「炎黃子孫」。有一次他又聽到這樣的說法，就回答：「我不是黃帝的子孫，我是蚩尤的子孫。」他的意思顯然是在駁斥台灣與中國乃「同文同種」這樣的說法。不過，雖然本土派學者應該都會支持林瑞明的看法，但是本土派的文學研究在討論台灣文學傳承或是把台灣文學放在一個比較文學的脈絡談論時，卻往往襲用「中國文學家族」的框架。以「家族譬喻」做為台灣文學研究的一種方法，必須注意兩個問題：

(一) 以台灣相當流行的張愛玲系譜為例。在台灣文學研究中，許多台灣女作家都被編派進

入一個所謂的「張派系譜」。雖然有些台灣女作家的確私淑張愛玲（朱天文 1996: 31-106；邱貴芬 1998: 142），但是用「家族譬喻」來串聯台灣女作家之間的關係，極易忽略了作家之間的差異性，網織出不甚可靠的文學家庭族譜。我們可以參照女性主義文學批評領域裡相關討論的洞見來看這個問題。早期美國以女性主義角度切入文學研究的學者經常致力於建構女作家系譜，論述重點在於尋找不同世代女作家創作的共同點，以便編織「屬於女性自己的」文學傳統。美國學者肖瓦爾特（Elaine Showalter）著名的《她們自己的文學》（*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是最佳的例子。而「文學的母親」（王德威說的「祖師奶奶」？）則成了女性文學批評裡常見的詞彙。但是，以「家族譬喻」來建構女作家系譜雖然有助於在高等教育體制裡開發女性文學的課程和支援女性文學研究，但是卻也在研究方法上造成重大的缺失：尋求女作家之間的一致性來建構文學家族，往往無法照應到作品的歷史脈絡，造成跨歷史性（*transhistorical*）的問題，作品的差異性易遭忽視或掩蓋，往往無助於深度、細膩地了解作家特殊的創作風格（Fitz 1993: 142-3）。張愛玲、蘇偉貞和李昂雖然都長於經營鬼氣森森的小說世界，但三者創作的風格恐怕殊異之處大過同質和重疊，以「家族譬喻」來譜織文學系譜可能漏洞甚多。

（二）另一個「家族譬喻」的文學論述問題則涉及我們把某一類作品放在什麼樣的脈絡中來閱讀，這背後的政治意義。目前把台灣文學放在一個較大架構下來探討的比較性閱讀，通常

採取兩個做法：以時間軸為主的比較閱讀經常把台灣文學和早期的中國文學或文化論述作縱的連結；如果是以空間做為參照指標，則經常把台灣文學放在「兩岸三地」（中國、台灣、香港）的框架中來討論。文學論述者必須意識到這樣的論述方法其實隱含「中國文學家族」這樣的暗示，鞏固「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個支脈」的傳統歷史敘述的權威性。

以家族譬喻為主要比較概念的台灣文學研究方法在台灣當眾行之有年，其中牽涉的問題與以往在西方中國研究領域一個相當流行的「文化中國」的研究概念有關。這個概念首先由在美國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學系任教的杜維明教授提出，意在重新定義「中國性」（*Chineseness*），鬆動傳統中國學研究以「中國」為中心的研究取向，提升台灣、香港和其他地區中文文學的地位。但是，以文學家族概念為基礎的「文化中國」其實並未撼動「中國」的高階位置，因為「文化中國」依然是「中國」，流露的仍是以「中國」為思考中心，與「中國」聯繫的欲望（Ang 1998: 231; Yeh 1998: 219）。另一方面，「中國性」所引申出來的問題不是把它變成複數，以許多華文地區來顛覆「中國」的中心位置就可以解決（Chow 1998: 24）。根本的問題是：「中國性」究竟是什麼或不是什麼？這是個難纏的問題，我將留待下文談及「台灣性」的問題時再深入探討。

以比較觀點論台灣文學，除了把台灣文學放在「中國文學家族」或是「文化中國」這樣的概念之外，我們又可能把台灣文學放在什麼樣的脈絡中來談？長年從事本土派台灣文學研

究的葉石濤在〈世界文學的寫實主義與台灣新文學的寫實主義〉所展現的論述取向可以提供另一種觀看台灣文學的方法。在這篇二〇〇〇年發表的論文裡，葉石濤先勾勒寫實主義在歐洲文學領域發展的情形，再闡述日本如何吸收歐洲和俄羅斯的寫實主義，於一九三〇年代發展出「日本風格濃厚的寫實主義文學，在普羅列塔利亞運動等左翼思想風靡之下發展成為社會主義寫實主義」(56)，接著再轉至中國文學領域，勾勒寫實主義在中國發展的情形。葉石濤認為，從明朝到清末，中國的古典小說以「自然寫實主義」為主流，五四文學大將魯迅在日本接觸了俄羅斯、日本等國的寫實主義，帶動五四時期「中國新文學的寫實主義」風潮。談論寫實主義在中國發展的情形之後，他提到台灣作家如何透過日文去接觸日本文學和歐陸文學的寫實主義，也同時閱讀中國古典小說和五四作家的作品。最後，他認為台灣作家在吸收這多重文學寫實主義傳統之時，發展出它獨特的風格：

台灣文學的寫實主義因台灣的殖民地社會而顯然具有特殊的風格和手法，不同於中國、日本和法、俄。台灣文學的寫實主義採用弱小民族反抗帝國主義的陰晦手法去實現，把尖銳的諷刺，黑色幽默巧妙地隱藏在作品中人物行為、對白或情節發展之中。日治時代的台灣，新文學不管是用中文或日文為書寫工具，不管是右或左派，但他們所依循的創作方式是寫實主義，殆無疑義。(51)

這樣討論台灣文學強調台灣文學與多國文學傳統的互動，一方面摒棄傳統論述把台灣文學放在「文化中國」的框架中的談法，不「溯源」中國文學傳統，以其為台灣文學傳統的源頭，一方面卻也強調台灣文學立基於其歷史經驗的特殊風格，其實也是摒棄「傳承」的概念，昭示一種以台灣文學為主體的台灣文學研究方法。葉石濤把台灣文學放在世界文學這樣的脈絡中來探討，提示我們台灣文化和文學的形塑和世界潮流有密不可分的关系，隱約指向一種全球視野。如果我們遵循這樣的方向，試探歷史流程裡以及現今全球文化／文學版圖裡的台灣文學，那又會帶出什麼樣的問題？我想看看以「全球化」的概念來談台灣文學，是否可以開展一些台灣文學研究的思考格局。

「後殖民之外」

不過，在進入相關的討論之前，我想先看看另外一個在目前台灣文學研究相當受重視的「殖民譬喻」的概念。以「殖民譬喻」做為台灣文學論述的基石在目前已相當普遍，這與嚴後台灣文學研究以後殖民理論做為理論基礎來通盤檢討台灣文化場域的權力衝突有關。把台灣文學的發展放入後殖民敘述的脈落來談，強調的是台灣被殖民的處境，以殖民和被殖民的概念來談台灣文學的流程。彭瑞金一九九一年出版的《台灣新文學運動四十年》和陳芳明

尚未完成但章節已陸續發表於《聯合文學》的《台灣新文學史》算是代表。必須注意的是，兩者著作時間相隔十年，台灣文化場域已有所變化，故兩者誰都主要以殖民譬喻來解釋台灣文學流程，但對台灣文學與其他文化互動的情形，切入角度有顯著差異。彭瑞金這本重要的著作寫作時間正是解嚴（一九八七）後不久，台灣本土文學的地位尚未確立，因此彭瑞金對五〇年代中國大陸移民來台的作家的文學，和六〇年代台灣受西潮影響而發展出來的現代主義作品都有嚴厲的批評（75, 107）。這樣的寫作策略顯然意在翻轉台灣本土作家文學長期受到打壓的情況。時隔十年，本土作家的地位已逐漸受到重視和肯定，陳芳明在評估傳承中國文學和西方現代主義文學傳統的台灣文學創作時，所採取的態度就比較寬容。例如，以殖民概念詮釋台灣現代文學的興起與功過，陳芳明認為：「國民政府為了代表中國，接受美國的經濟、軍事支援，並且使台灣被編入全球的冷戰體制中。與美國冷戰體制的結合，使台灣淪為文化殖民與經濟殖民的事實，則是公認的事實」（2000: 253。引者強調）。不過，即使台灣現代主義文學是在六〇年代文化殖民與經濟殖民歷史脈絡下產生，「現代主義確實為台灣作家開啟了一些思考上的窗口，心靈的釋放也許意味著逃避現實，但是在強勢殖民權力的陰影下，卻因此而維繫了許多活潑的文學想像」（陳芳明 2002: 254。引者強調）。

比較彭瑞金和陳芳明站在不同歷史時期所寫の後殖民敘述，可以發現早期以殖民／被殖民概念來談台灣文學の後殖民敘述較傾向於以負面角度評估非本土文學傳承，最近台灣文學

の後殖民敘述則因本土傳統已具相當地位，較能挖掘外來文學勢力與本土文學的瓜葛糾纏中究竟產生什麼樣具建設性的影響。以後殖民敘述做為台灣文學描述的主軸，在過去十年本土文學論述場域裡扮演重要的角色（邱貴芬 1999）。後殖民式的閱讀為台灣本土文學提供了一個挑戰以中國文學／文化為權威敘述的觀點，翻轉本土文學的低落位置。何謂後殖民閱讀呢？《後殖民研究關鍵概念》（*Key Concepts in Post-Colonial Studies*）有言簡意賅的說明：

一種閱讀和重讀大都會城市和殖民文化文本的方式，以強調殖民對許多書寫領域造成的深遠影響。這些領域包括文學生產、人類學解說、歷史記載、政府和科學的文章。

A way of reading and rereading texts of both metropolitan and colonial cultures to draw deliberate attention to the profound and inescapable effects of colonization on literary production; anthropological accounts; historical records; administrative and scientific writing. (1998: 192)

後殖民閱讀除了探討台灣文學生產場域如何受到政治勢力影響而產生各時期的特殊文學生態之外，也力求挖掘主流之外的閱讀方式，重新評估被忽視的本土作家作品。葉石濤、林瑞明、陳萬益、呂興昌、彭瑞金、陳芳明可算是這派閱讀的代表。不過，以殖民／被殖民為主要概念來解讀台灣文學流程也免不了產生幾個問題：（一）由於論述重點在於文學創作如何展現

對殖民勢力的回應（迎合？抗拒？或游走於曖昧邊緣？），後殖民角度的台灣文學敘述往往不知如何處理許多與殖民主題無關的創作（例如以家庭婚姻或情欲問題為主題的許多女性創作、著眼於後現代社會消費的作品、同志文學等等）。(二)更重要的問題是，步入二十一世紀，台灣已脫離日本殖民以及陳芳明所定義的國民黨以戒嚴統治台灣的「再殖民」時期，後殖民台灣文學敘述將如何處理後續發展的台灣文學作品？換言之，殖民／被殖民的譬喻如何適用於新階段台灣文學的發展？

一個比較便利的做法是挪用「新殖民」(neo-colonialism) 的概念，認為台灣雖然不再是實質的殖民地，但是在政治經濟甚至文化方面卻淪為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集團跨國公司的附庸，「經濟殖民」和「文化殖民」只是以另一種面貌出現而已。這裡產生的問題是對「殖民」這個概念的定義。「殖民」如果不再限定指涉一個國家被另一個國家占領統治，而可以擴大用來解釋幾乎所有的壓迫結構的話（經濟的、性別的、文化的，國家內部種族的不平等和族群之間的壓迫等等），那麼，這個名詞將喪失做為一種分析概念的功用，因為，在此情況下，就會如同阿莫德 (Aijaz Ahmad) 所警告的：

殖民主義於是變成一種跨歷史性的東西，永遠存在而且永遠在世界的這個角落或那個角落瓦解當中，因此每個人遲早都有機會變成殖民者、被殖民者和後殖民者——甚至有

時三者同時兼具，就像澳洲的例子一樣。

Colonialism thus becomes a trans-historical thing, always present and always in the process of dissolution in one part of the world or another, so that everyone gets the privilege, sooner or later, at one time or another, of being colonizer, colonized and postcolonial—sometimes all at once, in the case of Australia, for example. (1995: 9)

換言之，「殖民」一旦被用來指涉任何的權力壓迫結構，只要有權力關係存在，就有殖民者和被殖民者。這樣把「殖民」概念無限上揚和擴散的結果，並無助於釐清問題，也使得殖民論述批判原應具有的深厚歷史脈絡變得無足輕重。例如：以「男性對女性殖民」取代「男性壓迫女性」的說法，並向外拓展思考的面向，徒然增加曖昧和問題。

另外，從女性主義關懷台灣女性創作場域的變化的角度出發，我也發現後殖民理論力有未逮之處。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真正的實踐並不像許多人所認定的，只於挖掘女性情欲、提升女性傳統私人空間活動等等所謂「瑣碎政治」的重要性，或者只是挖掘被埋沒忽略的女作家，提高女性創作的能見度等等而已，更重要的是，以女性主義觀點切入，我們往往能照見許多習以為常的研究概念和方法的盲點。例如，從女性主義關懷女性創作的角度切入台灣文學史和斷代問題，我發現以殖民／反殖民做為台灣文學敘述的主軸，就無法充分照應大量與

殖民議題不甚相關的優秀女性創作。勉強套用這個敘述，往往犧牲了作品的創意和豐富性。例如：怎麼以後殖民理論來分析李昂現代主義時期的超現實作品？除了談台灣作家如何追逐盲目抄襲西方現代主義之外，我們又怎樣去欣賞這些作品的創意？施淑菁、聶華苓的作品也引發類似的問題（邱貴芬 2001a: 114）。從女性主義觀點來看台灣文學史通常建築在殖民譬喻上的斷代法，也讓我們看到了其中隱含的男性史觀問題。

另外，後殖民理論講求殖民與被殖民雙方對峙，或是被殖民的一方如何抗拒殖民勢力的策略（無論這策略多麼曖昧模糊），以後殖民觀點來看在地文化和外來文化的交會，難免會有兩種傾向：一、因為強調在地文化如何被外來殖民文化所宰制或打壓，主張在地傳統的重要性，這樣的論述極容易隱含一個假設——把「文化」視為凝固不變的東西，而忽略了文化是個不斷交流變化的過程。二、由於把在地文化和殖民文化對峙起來，企圖挑戰並進而顛覆殖民文化的權威性，因而很難去談即使這樣的文化交流過程，也有可能對在地文化產生一些不全然是負面的影響。以女性文學場域為例，單單從後殖民的立場出發，要談五〇年代大陸來台女作家對當時女性文壇的一些非負面的影響（如：當時這些受五四影響的女作家如何改變了原先相當貧瘠的台灣女性創作生態，請參見拙著 2001b: 322-4），實在無從談起。這樣說，並非認為後殖民論述於台灣文學無用。而是說，後殖民論述的切入點有助於解讀部分台灣文學作品和了解台灣文學過去幾十年的生態，但是卻無法充分解釋有些台灣文學創作和生

態的問題。

除此之外，目前台灣文學後殖民論述的重點在於國內文學生態的變化，較少以全球文化版圖的視野來談台灣文學的歷史流程。這樣的談法讓研究者把視野局限於國內，而缺乏以較宏觀的角度來看台灣文學在世界文化潮流中所扮演的角色。如果我們試圖了解過去台灣文學在世界文學版圖裡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未來可能占取的位置，顯然必須思考目前台灣文學後殖民理論所設定的方向之局限。以「全球化」的概念來談台灣文學，並非一概摒棄後殖民理論的概念，因為殖民勢力的發展正是「全球化」過程的一部分，後殖民理論所談到的文化議題也會是談「全球化」議題時觸及的，「全球化」提供的不過是一個較大的脈絡來看台灣文學的發展。這點底下的論文將有進一步的說明。

台灣文學與「全球化」

除了說台灣在歷史上是個殖民地，被殖民的經驗對台灣歷史有深刻的影響之外，現在我們還常說台灣是個移民社會，海洋國家。這是什麼意思呢？李筱峰《台灣史100件大事》所列台灣史上第一件大事是「荷蘭人占領台灣」：「一六二四年，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商船兼戰艦，進入今天台南安平，在南台灣建立起殖民政府，開始荷蘭人在台灣為期三十八年

的殖民統治」(李筱峰 1999: 12)。這件台灣史上第一件大事竟然是台灣與遠在地球另一邊的荷蘭發生關係。為什麼呢？李筱峰解釋：

隨著十五、十六世紀的所謂「地理大發現」及新航路的開闢，人類世界的歷史從過去的陸權時代逐漸進入海權時代。原為歐洲大陸邊陲的大西洋沿岸國家，因為發展航海事業，而逐漸躍居世界的中心。這些新興的海權國家，在「重商主義」的驅力下，紛紛往亞洲、美洲拓展他們的勢力。(李筱峰 1999: 12)

根據《台灣史100件大事》，台灣史上第二件大事為：「一六二六年，西班牙人占領台灣北部，開始其在北台灣的十六年殖民統治」(李筱峰 1999: 17)。從十七世紀二〇年代末期，「台灣開始轉口貿易」。接下來，台灣的歷史可說與殖民和資本主義兩大勢力的發展密不可分。在這過程當中，台灣逐漸步入工業化的社會，監管(surveillance)機制也透過政治勢力或國家機器在島上的發展逐漸成形，原先散亂在各地區域性掌控的械鬥武力也逐漸收攏到較統一的國家軍事體制之下。換言之，從台灣與荷蘭在十七世紀初接觸以來，台灣就捲入所謂的「現代性」，紀登斯所謂的「現代性的四大體制面向」(資本主義、工業化、監管、和軍事武力)逐漸在台灣出現(Giddens 1990: 59)。歷史上的台灣，顯然從十七世紀以來就存在於

全球海權角力版圖裡，其文化的形塑更與這過程當中所帶來的人口和資訊流動產生密切的關係。

阿帕度瑞(Arjun Appadurai)認為人口和資訊的流動對形塑「現代主體」(modern subjectivity)具有不可忽視的影響力(Appadurai 1996: 3)。銖許(Scott Lash)和俄歷(John Urry)也強調，現代社會的一大特質就是流動(mobility)——人和資訊快速頻繁的移動(Lash and Urry 1994: 252)。阿帕度瑞和銖許、俄歷所談的當然是現代社會電子資訊媒體所帶來的音訊流動，和因種種政治或經濟原因移民、移居，以及利用便利快速交通工具的旅遊觀光等等現代社會特殊的人口移動現象，但是，我們卻也看到人口移動(日據時代到殖民母國朝聖留學工作、戰後初期大量從中國移民來台的人口、六〇年代的留學潮和中小企業因對外貿易需要的出國交易、八〇年代之後的觀光旅遊活動等等)和與各國勢力(最主要的當然是日本、中國與美國)交會而帶來的資訊流動對台灣歷史產生的重大影響。如果：「現代性」是如紀登斯所說的誕生於十七世紀，那麼台灣的歷史顯然是一部「現代性」在台灣發展的歷史。

不過，如此談台灣歷史，卻有不甚妥當之處，主要關鍵在於「現代性」的概念。紀登斯雖然說「現代性」誕生於十七世紀，但是他也說，誕生的地點在歐洲(Giddens 1990: 2)。西方學界的傳統一向把「現代」(modern)視為西方的產物：「『現代』的概念向來就被牢牢地

固定在「西方」，然後透過不對等的殖民關係和全球資本主義的發展擴張到世界的其他角落。」(King 1995: 112; Featherstone 1995: 10) 這樣對「現代性」的認知以時間為重點，畫出「現代性」進展的軌跡，歐洲先而其他地區後，在「現代性」最初的時刻只有歐洲的存在，其他地區缺席，後來才「跟進」。金恩以(Anthony King)英國曼徹斯特這個工業城市的形成為例，指出這種說法的缺失：

這個在資本主義工業化歷史裡意義非凡的城市被當作無論在經濟上、社會上和空間上都相當自主，這顯然源於一個虛構的國家經濟的迷思。從來沒有人提到，這個城市經濟、社會、空間和建築環境的結果得自於一種世界性、全球性生產、消費和交換的過程，而且也建基於某種特殊的勞力分工、一種以曼徹斯特為中心的殖民生產模式。曼徹斯特這個棉花都市在場，而殖民地卻是缺席的。(1995: 111)

除非我們能夠對相當「歐洲中心」的「現代性」傳統論述提出不同的修正，否則把台灣納入「現代性」敘述，不僅讓台灣永遠有時間上落後西方的問題，陷入「抄襲仿冒」西方的困境，喪失主體性，而且也無法解釋台灣文化的異質性——也就是「台灣性」的特質。金恩對「現代性」提出的另類解釋，值得我們參考。在他的說法裡，「現代性」最先出現的地方

不在歐洲，反而是在傳統論述裡被視為位居「現代性」邊陲的殖民地：

我和巴巴一樣，都試圖證明如果「現代性」代表一種「開頭」的意識形態，一種「創新」的概念的話，那麼「現代性」真正出現的地方是在殖民的空間，而不是在都會地點……如果我們問，哪裡是我們現在所說的「現代多元」城市在歷史上發生的地方，答案絕對不是歐洲或北美、倫敦、洛杉磯或紐約這樣的「核心」城市，而可能是「邊緣」的地方，如里約、卡庫他或孟巴薩(King 1995: 114)

「現代性」的概念通常以時間軸為歷史想像的主要架構(因此人類歷史可斷代分為前現代、現代、後現代等等階段)，但是這樣想像歷史的方法大有問題。金恩就認為，所謂的後現代的各種特色——拼貼(pastiche)、不同歷史的雜混(the mixing of different histories)、精神分裂(schizophrenia)、破碎(fragmentation)、不連貫(incoherence)等等，最先出現的地點不在西方所謂「現代性」已極為發展的社會，反而早在殖民社會情境裡就已見到(King 1995: 121)。

在此情況下，「現代性」的概念要有相當大的修正。與「現代性」相關的一個議題是「全球化」。「全球化」是什麼呢？紀登斯認為：

「全球化」因此可被定義為全球社會關係的稠密化，相隔遙遠的地區都被連結在一起，以至於在某一地區所發生的事情其實是受到發生在很遠以外的事情所影響，反之亦然……地方性的改變是全球化的一部分，也是跨時間和空間的一種側面的社會關係延伸的結果。（Giddens 1990: 64）

再看看 Mike Featherstone 對此名詞的定義：

這個詞指涉一種全球壓縮的感覺，在此情況下世界愈來愈被認為是「一個地方」，而由於資金、物品、人口、資訊、科技和影像等等愈來愈大量而迅速地流動，國家也愈來愈難避免被捲入一種愈來愈緊密的結構所產生的種種效應。（1995: 81）

湯林森同樣認為「全球化」代表一種現代生活型態中愈來愈緊密的相互連結和依賴（Tomlinson 1999: 2）：這種狀態他稱之為「複雜的聯繫」（complex connectivity），是一種透過現代各式傳媒，超越時空距離的阻隔，讓異文化穿透到各地，對在地日常生活產生無名影響的結構（Tomlinson 1999: 43）。

雖然紀登斯認為「全球化」是「現代性」發展的結果（Giddens 1990: 65-6），但是，卻

也有其他讀者不認為「現代性」和「全球化」必然有如此的關係。杜色（Enrique Dussel）從世界系統（world-system）的角度出發，認為透過所謂的「發現新大陸」，因為美洲大陸全被納入世界版圖引發的全球區域經濟勞力分工的重新配置和文化互動，觸動了「現代性」的產生；換言之，是「全球化」造就了「現代性」，而不是「現代性」造成「全球化」（Dussel 1998: 45）。羅伯森（Roland Robertson）則提出另一種有關「現代性」和「全球化」關係的看法。他認為，應該用「全球性」取代「全球化」來思考相關的問題，兩者是並置而非一前一後：

著眼於全球化讓我們避開所謂全球或只是現代性的效應這樣論證的缺陷。說得明白一點，全球化是一種普遍性的狀態，這樣的狀態加強了一般「現代性」的擴散；在這一點，「全球性」應就各地區不同文明的互相穿透來理解。（Robertson 1995: 27）

無論我們採取何種看法，比較「現代性」和「全球化」的概念，顯然後者更重視空間性。根據哈維（David Harvey）的解釋，由於「現代性」有關在現代化過程中人所經歷的「進步」或「進展」（progress），「現代性」論述當然會傾向於強調時間的重要性——也就是轉化（becoming）的過程，而較不談與固定存在（being）較相關的空間和地方（Harvey

1990: 205)。強調時間或強調空間，這種論述重點或框架的爭辯，與我們何干？對我們思考台灣文學、文化、歷史相關的議題又有什麼影響？「現代性」敘述主要建基於「進展」這個概念所帶出來的種種對人類歷史和社會的想像，在這個以時間軸為主的敘述裡，歐美社會型態被視為衡量的標準，把人類的社會分成未（或低度）開發、開發中和已開發國家。未（低）開發國家被視為不夠「進步」、不夠「現代」，理應努力朝歐美這種「已開發」的「現代」國家看齊，摒棄其「落後」傳統的文化與習俗（Mignolo 1998: 36）。這樣的「現代性」想像隱含一個對非歐美國家相當不利的價值判斷結構：西方（歐美）＝現代＝進步；東方＝不夠現代＝落後。空間的想像提供一個容納異質的場域，讓「他者」得以被看重而重新評估。在地性不再被貶抑。這也說明，為什麼「全球化」不是一個文化「同質化」的過程。「同質化」和「異質化」在「全球化」的過程中乃共生共存。如同許多觀察文化的學者所指出的，在「全球化」的潮流中，我們並未見到文化同質化的趨勢，反而看到各地在地文化異質日益受到重視和保護（Feathersone 1995: 110; Smith 1990: 175; Robertson 1995: 35-40）。在實際的運作上，雖然快速消除時空阻隔的電子資訊愈來愈發達，其網絡愈來愈普及，文化傳播也愈來愈迅速廣泛，但是，這些電訊媒體同樣也創造了以往不可能有的互動，讓具有同樣文化、族群或社群背景的人更能迅速地建立聯絡網絡，鞏固或創造在地性的或小社群的認同（Smith 1990: 175; Ginsburg 1995: 262）。台灣現在網路流通的《原住民電子報》（<http://wtatw.uhome.net/index.shtm>）是我們在地最佳的例子。

uhome.net/index.shtm) 是我們在地最佳的例子。

尋找台灣文學的「台灣性」

根據以上的討論，「在地化」和「全球化」其實共生共存。我想整理歸納一下，在現時「全球化」資訊傳播媒體愈來愈發達的時代，對在地文化的重視究竟是在什麼樣的背景之下產生？我想第一個原因是激烈的「全球化」帶來所謂「帝國文化主義」的威脅，處在弱勢文化區的人擔心強勢文化會藉現代資訊媒體強大的傳播力量推銷到各地，產生文化同質化的問題。重新挖掘和創新在地文化可以牽制這樣的趨勢。其次，吊詭的是，這樣的全球資訊網絡竟創造了在地認同結盟的基礎，協助「在地性」身分認同的建構。另外一個比較不為人探討的原因與全球化資本主義的市場需求有關。哈維認為，在資本快速大量流動的情況之下，地方與地方之間的競爭愈趨激烈，每個地方都要想盡辦法創造特色，以便吸引資金的投注，開創地方的生機（Harvey 1990: 295; 1993: 8）。在此情況下，許多地區都會竭盡所能創造和強調在地化，其運用的策略包括推銷在地形象、爭奪文化和象徵資本的詮釋權、復興在地庶民傳統等等（Harvey 1993: 8）。有關文化議題的思考其實往往和政治經濟這些相當現實層面的權力爭奪大有關係（Harvey 1993: 21）以台灣文學為例，思考台灣文學在全球文化版圖的位

置，第一個要回答的問題就是台灣文學要如何與其他國家或地區的文學區分？台灣文學的特色或特點（賣點）在哪裡？這樣的問題顯然與所謂台灣文學的「台灣性」有關。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必須回到論文開頭有關「中國性」的爭議。

美國著名的學術期刊 *Boundary 2* 在一九九八年秋季發行了有關「中國性」議題的專輯，我將以這個專輯所刊登的周蕾、奚密和 Len Ang 等三人的論文所提出的觀點為主，透過有關「中國性」的反思來探討台灣文學的「台灣性」問題。周蕾在導論裡提到，西方論述在討論西方文化時，都不必特意標示地區：如《性別麻煩》（*Gender Trouble*）、《美學問題》（*The Problem of Aesthetics*）等等。但是，只要是探討非西方國家的論述，就一定要在主題前面加上特定標示，如：日本、越南、中國、韓國等等。周蕾認為這樣的「族裔標籤」反映了一種「受傷者的邏輯」（the logic of the wound）。也就是說，迷戀般地特意標示「中國」，無異把中國和中國之外的世界其他地區加以區隔，隱含一種「中國中心」或「中國本位」的心態（Chow 1998: 6）。而被用以區隔中國和中國以外的「中國性」究竟是什麼呢？周蕾指出，「中國性」往往與中國的（古典）文學傳統連結：古典傳統代表純正的「中國性」（或「中國特質」），而現代文學因與外國文學交流而「污染」，不純粹「中國」（Chow 1998: 17）。周蕾認為，「中國性」必須被當作一個開放的符號，不見得指回那個地理上實質的「中國」。但是，周蕾也不認為，把「中國性」變成複數就可以解決問題（Chow 1998: 4）：「中國性」

的內涵應該要被激進地質疑。

周蕾的批判主要似乎在於解構「中國性」，她的關懷重點在於這個符號如何在尊重文化差異的表皮下隱藏種族歧視。這個辯證的論點主要以巴里巴（Etienne Balibar）有關新種族主義（neo-racism）的理論做為支撐。巴里巴認為，以生理或遺傳特質建構差異並從中分出人類高低不等的位階固然是種族歧視慣用的伎倆，文化差異也可被用來把人鎖入某套不可變的系譜（Balibar 1991: 22）。以反猶太主義為例：反猶太主義對猶太人的迫害並非訴諸於猶太人在生理上與西方白人的不同，猶太人之被迫害主要因為他們的文化不同，所傳承的精神傳統與西方主流傳統不一樣（Balibar 1991: 23-4）。周蕾對「中國性」的批判主要在於這個符號如何被用來區隔內外：西方學界用這個符號把華裔學者鎖入一個所謂的「中國學系譜」，排除在西方主流論述之外（華裔學者只能做與中國相關的研究）；而漢學家或中國學的學者則強調「中國性」和西方的不同，投射一種中國沙文主義。

奚密的論文同樣關心「中國性」如何被挪用的問題以及「大漢中心主義」，不過她的關懷重點和周蕾不同。奚密的焦慮在於：誰具有論述「中國」的權利／權力？住在中國的學者以實際（居住在中國的）經驗做為他們論述的支撐，認為華裔學者不住在中國，不具真正了解中國的能力。奚密認為這樣的論點是建基於對所謂「正牌」（authenticity）和「起源」（origin）的迷思（Yeh 1998: 208-9）。另外，針對「中國性」所帶出來的中西文化差異的問

題，奚密認為，

中國知識分子兩難的困境在此：如果向西方學習讓中國可以迎頭追上西方的話，假藉這些西方理論讓中國永遠落後西方。因此，當中國向西方學習之時，她必須同時強調其中的「中國性」，不管是這些學習的東西的起源（例如：宣稱西方科學、民主、平等、自由等等概念的原型早就存在於古代中國），或是結果（例如：在二十世紀初許多中國知識分子接受「中國種族源自西方」這樣的理論）。（Yeh 1998: 211-2）

像 Ang 和周蕾、奚密一樣，認為「中國性」是個開放的符號（Ang 1998: 225），她批判杜維明「文化中國」對「中國性」這個概念的執守（Ang 1998: 230-1）。她也同樣指出，「中國性」在西方如何被用來特別標示華裔學者，以及其中隱藏的種族歧視（Ang 1998: 235）。Ang 拒絕以種族（炎黃子孫）來定義身分，認為只有當「中國性」不再被當作信守無疑的決定身分要素之時，才有與世界交流的較大空間（Ang 1998: 241）。

熟悉解嚴以來台灣文學場域關切議題的讀者，必然可以從以上的討論聯想到台灣文學場域裡爭辯的類似問題。我們同樣關切誰可以定義「台灣」？我們同樣強調地理位置和與土地連結居住經驗的重要性。我們認為居住在台灣的人最有資格定義「台灣」、詮釋「台灣」。這

樣的做法同樣引來「台灣中心主義」的非議。我們同樣強調「台灣」做為標籤的重要性，因為只有這樣強調文化差異，我們才可能區隔台灣和中國的不同。同樣的，當我們進入全球文化場域時，我們標示的是「台灣」經驗，台灣與中國、西方的不同。我們會贊成上述這些居住在西方地區的華裔學者對「文化中國」的質疑，也會同意他們對西方以「中國」為中心的學術研究取向所做的批判，但是，我們會同意放棄地理和生活經驗做為詮釋「台灣」的基礎嗎？我們願意把「台灣」視為一個開放的符號？開放到什麼地步？而如果不這樣做，我們是否會面臨論述「圍堵」的危機，也就是說，當我們強調只有居住在台灣的人才能詮釋「台灣性」的時候，會不會阻斷其他人參與討論和傳播台灣文學的可能，壓縮台灣文學在全球文化場域的空間？

另一個重要的問題是：「台灣性」是什麼？周蕾認為「中國性」往往奠基在一個「受傷者的邏輯」之上。在 *Boundary 2* 這個專輯的論文裡，她提到這個邏輯展現在以「中國」做為文化差異的標示，區隔中國與西方，強調「中國」的特殊性。在另一本於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書裡，她說，中國文學之所以為一個國家文學，為了標示它有別於西方，往往強調中國現代文學中所展現的對社會強權的抗拒和批判。站在弱勢普羅大眾立場（階級）對不公不義的壓迫結構的控訴成了中國文學之所以「中國」的展現（Chow 1993: 102-3）。我想，台灣文學的讀者應該也會在此看到台灣文學論述類似的策略：台灣文學同樣訴諸反壓迫的精神，不同的

是，如果階級意識在中國現代文學裡被特別看重，通常台灣文學所凸顯的「種族」和「族群」部分卻重於「階級」。

有關「中國性」的質疑不免讓我們相照來看「台灣性」的問題。我們怎麼處理這些棘手的問題呢？我想從兩個方向來處理這些問題：一個是從「比較」的觀點，看看國外相關領域——特別是女性主義有關「女人」這個性別標示，以及美國非裔族群對「黑人」這個種族標籤或位置的討論——如何處理類似的問題。在這兩大領域裡，「女人」和「黑人」這兩個性別和種族標籤曾引起與「中國性」類似的質疑。一派學者以「差異」訴求做為抗爭的基礎，強調女人和男人的不同（生理的或是生活社會經驗的）、黑人和白人的不同，著重探討「女性特質」和「黑人特質」，這一派被統稱為「本質主義」；另一派學者則解構「女人」和「黑人」這兩個概念，認為這種差異是論述建構的結果，應質疑其存在，這一派被統稱為「反本質主義」（Showalter 1989: 355-7, 362-7; Smith 1989: 39-44）。這裡同樣牽涉到誰有權利或資格談論女人的或黑人的文學或文化？也同樣牽涉分離主義和周蕾談「中國性」時所提到的「圍堵」問題。綜觀這兩派之爭，有些學者認為解構策略激進質疑「女人」或「黑人」這兩個概念的結果是瓦解認同的基礎，而且極容易滑入以前忽略性別種族壓迫的男性或白人中心觀點的論述（Showalter 1989: 357; Smith 1989: 44）。衡量兩者的利弊得失，或許論述的重點不在泯滅差異，而是探討造成這差異的社會和歷史條件，以及差異如何被策略性運用？產生

什麼樣的效應？

這樣的看法，其實非常接近Ien Ang在討論「中國性」之為一個開放符號時的觀點：

換言之，重點不在否認「中國性」的存在（在一個幾億人口自願或非自願的、源於各種原因認定自己是中國人的世界，否定「中國性」的存在是徒勞無功的），而是去探討這個分類如何在不同的社會、地理、政治和文化脈絡裡實際運作的情形。如同史都華·霍爾所說的，雖然種族不是一個真正有憑據的科學分類，但是這並不影響它的象徵和社會效用。同樣的說法也可被運用到「中國性」之上。強調分類和類別系統是被建構出來的，這是「不把理論重點放在『類別用來儲存文化』」（the categories “in themselves” as repositories of cultural [meaning]），而把重點放在文化分類的過程（the process of cultural classification itself）。換言之，我們要問的是，「中國性」這個類別為什麼這麼穩固？怎樣達到這個穩定性？產生了什麼樣的政治和文化效應？（1998: 227）

參考以上的討論，現在我想試圖提出個人有關「台灣性」的淺見。「台灣性」是什麼？我認為「台灣性」並沒有單一固定的內容，而是一種相對性的概念，在不同的脈絡裡會展現不同的面貌，端看它被策略性地放在什麼樣的位置來呈現。例如，想要強調台灣被壓迫狀態

時，可能論述重點在於台灣被殖民的歷史和情境；想要朝台灣的多元文化交流方向去思考時，可能論述重點就會放在「海洋」意象、「海洋文化」等等，想要與西方文化做區隔時，可能會策略性強調台灣「東方」或是「第三世界」的面向。不過，這並不表示「台灣性」是個全然開放的符號；「台灣性」所呈現的面貌雖然依論述脈絡不同而有所改變，但是其面貌仍受台灣歷史社會等具體實況所限制，不同階段的殖民情境對台灣文化形塑的影響，仍是「台灣性」重要的質素。

因此，談「台灣性」，在什麼樣的脈絡裡呈現什麼樣的「台灣性」是個重要的問題。論述者選擇呈現某種「台灣性」，主要的對話或抗爭對象是什麼？企圖達到什麼樣的效應？產生了什麼樣的副作用？以台灣後殖民論述所呈現的「台灣性」為例。現在我們常說，台灣文學的特質（也就是台灣文學的「台灣性」）是「反殖民」、「反封建」、「反霸權」，通常強調的是被殖民被壓迫的情況，但是，占據這個「被殖民者」位置的通常是「本土」（不管是福佬族或客族或原住民）男性。周蕾在談中國文學之所以為一個國家文學時，說到在後殖民時代要建立國家文學，無法只訴諸於豐富的文學傳統，往往還需要一個批判性的介入點。就中國文學領域而言，那個批判性的介入點就是「階級意識」；中國的建國工程是訴諸於一個「無產階級人民的國家」，中國文學「現代性」最重要的一個特徵就是以「階級意識」建國（Chow 1993: 102-3）。這裡涉及的當然就是弱勢被壓迫者發聲反抗壓迫的問題。由於抗拒

的、被迫害者的位置已被男性無產階級所占據，也就是說，男性無產階級「代表」所有中國人民發聲，中國女性往往找不到發言位置，她們的聲音因而無從發出（Chow 1993: 111-2）。我們可以周蕾對中國文學這樣的批判來反省台灣文學的問題。在建構台灣文學為國家文學的工程當中，我們訴諸的是「被殖民者」群起反抗殖民壓迫，建立自己主體性的過程；在這當中，由於占據這個被殖民者的或是受害者位置的往往是男性，女性往往無從發聲。這樣的檢討應不為過。同樣的，以「全球化」為主要概念來談「台灣性」，強調台灣文學的開放與多元文化並存的「移民社會」特質，我們要注意的是應該同時分析這多股多元文化之間的角度和權力關係，以免喪失從事文化觀察所需的批判思考立場。Ien Ang 反省「中國性」所提出的建言應可對照來看：「『中國性』這個類別為什麼這麼穩固？怎樣達到這個穩定性？產生了什麼樣的政治和文化效應？」當然，在這裡我們必須用「台灣性」來置換「中國性」。

另外，有關誰最有資格呈現「台灣性」，以及誰呈現的「台灣性」最具代表性的問題，我認為這種問題問法徒然模糊思考的焦距。不管再怎麼爭辯，不管再如何界定所謂的資格的問題，我們都無法禁止不同的人從不同的立場來呈現「台灣性」。以原住民為例或許更能讓我們看到這個問題的難解之處。由於種種原因，原住民外移到都會地區是相當普遍的現象。誰最能代表原住民？最能定義「原住民特質」呢？是留守在部落的原住民還是都會原住民？這個問題可能難有統一的答案。我認為，與其問誰最有資格呈現「台灣性」或是誰呈現的

「台灣性」最具代表性，不如問：這樣呈現「台灣性」是坐落在怎樣的對話脈絡？想要達到什麼樣的目的？造成什麼樣的效應？壓抑了什麼樣的問題？

最後，我想回應奚密所提出來的向西方學習的問題和周蕾提出來的我們需不需要中國或台灣標籤的問題。奚密認為，「中國知識分子兩難的困境在此：如果向西方學習讓中國可以迎頭追上西方的話，假藉這些西方理論讓中國永遠落後西方。」類似的問題也常在台灣文學場域裡出現。奇怪的是，如果引用西方的理論涉及借用，以及複製、抄襲、追趕流行等等問題，為什麼引用葉石濤、林瑞明、陳萬益或是呂興昌的論點，就未曾引起同樣的疑問？難道文化論述也有「愛用國貨」的前提？那麼，為什麼引用孔孟學說或魯迅、高行健的說法，也都沒有所謂複製或抄襲外來理論的問題呢？而如果使用源自西方的東西就是「追趕流行」，我也沒看到哪個學者家裡沒用冰箱電視機，使用電腦軟體時堅持不用IE或Zetscape。周蕾對族裔標籤的質疑，以及巴里巴所說的文化差異被用來合理化種族歧視當然是個存在的問題。但是，這些討論都讓我想到以前女性作家不願被稱為「女」作家，女性學者希望被稱呼為「先生」，以示與男性平起平坐。「女性」或「台灣」標示的是一種特定切入論述的位置，輕易抹滅這些符號，其實很容易回到「普世主義」(universalism)時代以西方和男性中心為標準的大一統時代。

世界文化場域裡的台灣文化

站在二十一世紀初來談台灣文學，我們很容易忘記「台灣」這個名詞得來不易，連帶的「台灣性」是什麼？」這個問題也未有足夠的時間來探討。台灣社會在一九四五年之前一直是依附著日本符號，而一九四五到台灣解嚴的一九八七年則轉而依附中國符號，在這漫長的歷史歲月裡，「台灣」一直是個禁忌的符號。從一九八七年至今不過短短十來年，這中間「台灣」的內涵和實質的意義才逐漸在台灣文化場域裡有所討論。顯然要充分回答「台灣性」是什麼這個問題，我們還有一段漫長的路要走。

如果我們要找尋台灣文學／文化，不一定必須依附在「文化中國」或「日本殖民地文化」的框架，卻依然能夠在被看見的空間，我們當然要思考在全球文化場域裡，台灣究竟占取什麼樣的位置？有什麼樣的發言空間？必須以什麼樣的方式來再製其文化？這或許將帶我們回到本論文開始的「中國家族譬喻」問題。台灣文學在全球文化場域裡顯然相當遭受忽視。王德威曾在〈華麗的世紀末——台灣：女作家、邊緣詩學〉這篇文章裡提到：

在中國小說的現代化過程中，女作家的貢獻有目共睹。然而除了陳若曦外，極少台灣女作家受到海外評論者的嚴肅關注。當女性主義評論者處理當代中國女作家這一論題

時，他們多半只把眼光放在中國大陸。他們的「邊緣詩學」(Poetics of Marginality) 往往開始於政治地理中心論 (Geopolitics of Center)。這使我想，如果李昂、平路和朱天文這樣的作家不是在台灣而是在大陸從事寫作或發表的話，她們將會在世界受到何等的重視？(1993: 161)

這段話點出了台灣文學在全球文化場域裡艱困的處境。如果台灣文學在全球文化生產中被編派到如此邊緣的位置，那麼，從邊緣出發的台灣文學發聲策略又有什麼樣的可能形式？第一種可能，也是目前相當常見的做法，就是依附在「中國文學家族」這樣的概念下來進入全球文學／文化討論空間，吸引其他國家對台灣文學的興趣。但是，這樣的做法其實並未真正顛覆台灣的邊緣位置。就如王德威在同一篇文章裡提到的，許多學生／學者認為「台灣作家作品不足以代表中國文學」，「真正」代表「中國文學」的是生長於中國大陸的作家寫出來的有關大陸經驗的作品。顯然以「中國文學家族」這樣的身分來進入全球文化生產再製場域，企圖奪得一個發言位置，其結果可能無助於提升台灣文學的位置，合理化台灣文學的研究。另外一種做法，是以「台灣」做為一種符號，強調台灣文學／文化的「台灣性」(“Taiwanese-ness”)。日本在這方面的做法值得我們借鏡。歷史上日本曾從中國和西方吸取不少文化，但是不管是中國儒家文化也好，或是中國傳至日本的佛教文化也好，日本都能經過

選擇性吸收的過程轉化成一種所謂「日本特質」的文化，再以這樣一種「日本」符號的文化產品回到全球文化場域裡來與其他文化和中國文化對話 (Robertson 1991: 76)。當然，可能更靈活的一種做法是「化整為零」，不一定要進入以「國家文學」為規畫重點的文化場域，全球文化場域有許多是以「國」之外為關懷重點的：「性別」、「多元文化」、「現代性」、「流行文化」等等文化交流的場域都可以偷渡「台灣」經驗。問題是，即使在這些不以「國家」為分類的文化討論場域裡，各個討論者仍有特定的發言位置，而其發言的特色或被聽見、看見的程度往往取決於他發言內容所透露的特殊歷史或地理經驗。這是為什麼「『台灣性』是什麼？」這個問題無法迴避的原因。最根本的問題是這符號的特質和內涵是什麼？「台灣性」或「台灣特質」究竟是什麼？只有回答了這個問題，我們才可能創造台灣文化在全球文化場域裡的新契機。而這個問題可能的種種解答方式，或許要在台灣獨特的歷史經驗和遺產裡去尋求。

引用書目

中文部分

王德威。1993。〈華麗的世紀末——台灣·女作家·邊緣詩學〉。《小說中國：晚清到當代的中文小說》。

- 台北：麥田。161-92。
- 朱天文。1996。〈自序：花癡前身——記胡蘭成八書〉。《花癡前身》。台北：麥田。31-106。
- 李筱峰。1999。《台灣史100件大事》(上、下冊)。台北：玉山社。
- 邱貴芬。1998。《(不)同國女人詔喚：訪談當代台灣女作家》。台北：正聲文化。
- 。1999。〈台灣(女性)小說史學方法初探〉。《中外文學》27.9(1999.2): 5-25。亦見本書。19-47。
- 。2000。〈從戰後初期女作家的創作談台灣文學史的敘述〉。《中外文學》29.2(2000.7): 313-35。亦見本書。49-82。
- 。2001a。〈落後的時間與台灣歷史敘述——試探現代主義時期女作家創作裡另類時間的救贖可能〉。《Intergrams: Studies i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3.2(2001)。亦見本書。83-110。
- 主編。2001b。《日據以來台灣女作家小說選讀》(上、下冊)。台北：女書文化。
- 陳芳明。2002。《後殖民台灣：文學史論及其周邊》。台北：麥田。
- 彭瑞金。1991。《台灣新文學運動四十年》。台北：自立晚報。
- 葉石濤。2000。〈世界文學的寫實主義與台灣新文學的寫實主義〉。《文學台灣》34(200.04): 47-66。

英文部分

- Ahmad, Aijaz. 1995. "The Politics of Literary Postcoloniality," *Race and Class* 36.3 (Jan-Mar, 1995): 1-20.
- Ang, Ien. 1998. "Can One Say No to Chineseness? Pushing the Limits of the Diasporic Paradigm," *Boundary 2* 25.3 (Fall, 1998): 223-42.

- Appadurai, Arjun. 1996. *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 Minneapolis, Minn.: U of Minnesota P.
- . 2000. "Grassroots Globalization and the Research Imagination," *Public Culture* 12.1 (2000): 1-19.
- Ashcroft, Bill. Gareth Griffiths and Helen Tiffin. 1998. *Key Concepts in Post-Colonial Studies*.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 Balibar, Etienne. Immanuel Wallerstein. 1991. "Is There a 'Neo-Racism'?" *Race, Nation, Class: Ambiguous Identities*. London; New York: Verso. 17-28.
- Bird, Jon et al. Eds. 1993. *Mapping the Futures: Local Cultures, Global Change*.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 Chow, Rey. 1993. *Writing Diaspora: Tactics of Intervention in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Bloomington; Indianapolis: Indiana UP.
- . 1998. "Introduction: On Chineseness as a Theoretical Problem," *Boundary 2* 25.3 (Fall, 1998): 1-24.
- Cohen, Ralph. Ed. 1989. *The Future of Literary Theory*. New York: Routledge.
- Cox, Jeffrey N. Larry J. Reynolds. Eds. 1993. *New Historical Literary Study: Essays on Reproducing Texts, Representing History*.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P.
- Devereaux, Leslie. Roger Hillman. 1995. *Fields of Vision: Essays in Films Studies, Visual Anthropology, and photography*. Berkeley: U of California P.
- Dussel, Enrique. 1998. "Beyond Eurocentrism: The World-System and the Limits of Modernity," *The Cultures of Globalization*. 3-31.

- Ezell, Margaret J. M. 1993. "Re-visioning the Restoration: Or, How to Stop Obscuring Early Women Writers," *New Historical Literary Study*. 136-50.
- Featherstone, Mike. Ed. 1990. *Global Culture: Nationalism, Globalization, and Modernity: A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Special Issue*. London; Newbury Park: Sage Publications.
- . 1995. *Undoing Culture: Globalization, Postmodernism and Identity*. London; Thousand Oaks, Calif.: Sage Publications.
- . Scott Lash and Roland Robertson. Eds. 1995. *Global Modernities*. London: Thousand Oaks, Calif.: Sage Publications.
- Giddens, Anthony. 1990.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P.
- Ginsburg, Faye. 1995. "Mediating Culture: Indigenous Media, Ethnographic Film, and the Production of Identity," *Fields of Vision*. 256-91.
- Jameson, Fredric. Masao Miyoshi. Eds. 1998. *The Cultures of Globalization*. Durham: Duke UP.
- Harvey, David. 1990.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Mass.; Oxford: Blackwell.
- . 1993. "From Space to Place and Back Again: Reflections on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Mapping the Futures*. 3-29.
- King, Anthony D. Ed. 1991. *Culture, Globalization and the World-System: Contemporary Conditions for the Presentation of Identity*. Basingstoke: Macmillan.
- . 1995. "The Times and Spaces of Modernity (Or Who Needs Post-modernism?)," *Global Modernities*. 108-23.

- Lash, Scott. John Urry. 1994. *Economies of Signs and Space*. London; Thousand Oaks, Calif.: Sage Publications.
- Mignolo, Walter D. 1998. "Globalization, Civilization Processes, and the Relocation of Languages and Cultures," *The Cultures of Globalization*. 32-53.
- Robertson, Roland. 1991. "Social Theory, Cultural Relativity and the Problem of Globality," *Culture, Globalization and the World-System*. 69-90.
- . 1995. "Glocalization: Time-Space and Homogeneity-Heterogeneity," *Global Modernities*. 25-44.
- Showalter, Elaine. 1989. "A Criticism of Our Own: Autonomy and Assimilation in Afro-American and Feminist Literary Theory," *The Future of Literary Theory*. 347-69.
- Smith, Anthony D. 1990. "Towards a Global Culture?" *Global Culture: Nationalism, Globalization, and Modernity*. 171-91.
- Smith, Valerie. 1989. "Black Feminist Theory a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Other'," *Changing Our Own Words*. 38-57.
- Tomlinson, John. 1999. *Globalization and Culture*. Cambridge: Polity P.
- Wall, Cheryl A. Ed. 1989. *Changing Our Own Words: Essays on Criticism Theory, and Writing by Black Women*. New Brunswick: Rutgers UP.
- Yeh, Michelle. 1998. "International Theory and the Transnational Critic: China in the Age of Multiculturalism," *Boundary 2* 25.3 (Fall, 1998): 193-222.